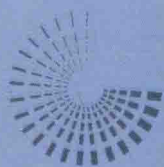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王东仓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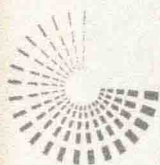
延安

——中国现代革命的符号

YanAn

ZhongGuo XianDai GeMing De FuHao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王东仓 著

延安

——中国现代革命的符号

YanAn

ZhongGuo XianDai GeMing De FuHao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安：中国现代革命的符号 / 王东仓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7

ISBN 978 - 7 - 5115 - 2712 - 7

I. ①延… II. ①王… III. ①延安精神—研究

IV. ①D648.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5639 号

书 名：延安：中国现代革命的符号

著 者：王东仓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陈 红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844

网 址：www. peopledailypres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6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5 - 2712 - 7

定 价：48.00 元

前 言

提到延安,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想到“革命圣地”这一称谓。然而,作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延安何以“革命圣地”化的问题,却一直是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甚至可以说是被忽略掉的问题。延安的“革命圣地”(以下一般简称圣地)形象,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未概念化的延安精神的外在表现。延安“圣地”形象的传播,就是延安精神的弘扬,追溯“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延安的符号化过程,便是探究延安精神何以产生的努力之一。延安之“圣地”形象,对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众支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争取话语权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探究延安的史实固然很重要,但考察延安在时人心中的形象更加重要,因为后者决定了延安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它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延安时期中共革命何以能够胜利的又一途径。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出发,借助传播学的思路 and 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察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进而探讨形象与精神、艺术与政治间的关系。

在中共加强宣传工作及外界关注延安的情形下,由延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文教机构、宣传媒介、文艺团体及个人等,与前来延安访问、考察的中外记者、民主人士、传教士、国际友人、国内外政治和军事观察组织等,共同组成了“圣地”形象的建构体系。从延安的角度看,这个建构体系由内(延安方面的)、外(国统区和海外的)两部分构成。在内部体系中,又形成了指挥系统(政治机构)、动力系统(教育机构)、传输系统(新闻媒介)、生产系统(文艺机构)等构成要素。他们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具体策划、各展所长,建立起高效的工作机制,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中外记者和国际友人等组成的外部体系,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影响,其活跃期主要是抗战初期和1944年春夏之间。内外系统之间,并不存在隶属联系,但他们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有着默契配合。

按照传播学的分类方法，“圣地”形象之载体，可以从传媒层面分作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及其他媒介三类。它以大众传媒为主，其他传媒为辅，是一个综合传媒系统。印刷媒介方面，陕甘宁边区仅抗日战争期间出版发行的报纸就有100多种，目前存留的或者知道名称的有40余种；出版了各种期刊大约60余种，其中24种属于文艺期刊。延安在国统区的印刷媒介，大概可以分作三类：取得合法地位、公开出版的中共报刊；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影响下的进步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统一战线中的报刊、出版物。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其他的媒介，搭载着通讯、报道、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木刻画等形式的艺术作品，将延安的“圣地”形象传递给海内外各层受众。

中外记者和国际友人等奔赴延安，就是为了揭开蒙在延安身上的那一层神秘的面纱。于是，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延安的种种形象被来访者一一揭秘：“白色围城”“红色堡垒”“民族解放的熔炉”“中国青年的圣地”“民主的模范”“中国的希望”等。延安方面通过“集中展示”和“日常展示”两种方式，也向边区、各根据地、国统区及海外受众展示延安的不同侧面，如“抗日与民主”“青春延安”“坚强延安”“生产模范”“大众文化”“进步延安”“艰苦笃实”等。上述有关延安的各种形象，是怎样凝结成“革命圣地”这一统一形象的呢？为此，本文进一步考证了延安“革命圣地”的由来，通过“他说”“自说”和“我说”三种解释，分析了延安“圣地”化的原因。延安到底是谁的“圣地”？通过对延安誉称的“自称”和“他称”的分析，本文认为，所谓“圣地”，首先是共产党员的“圣地”，其次是革命青年的“圣地”，再到后来，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属于一切爱好民主与和平的爱国人士及广大侨胞。

“太阳”“救星”“毛圣人”等，集多种形象于一身的毛泽东，是延安形象的核心与灵魂。中外记者多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入手来发掘他的领袖气质，延安方面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及人民大众，则基本选择了直抒胸臆，称毛泽东为“人民救星”，将他比作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太阳，高唱“毛主席来了晴了天”。群众为什么如此热爱和拥护毛泽东？首先，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其次，毛泽东是最模范的群众路线实践者，他最善于与老百姓沟通，能够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化，达到了与群众心灵相通的境界。第三，毛泽东是一个出色的政治预言家，当他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预言一一为现实所证实时，信任、追随和拥护他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最后，由于各种媒介的宣传，毛泽东的伟大事迹家喻户晓，他在

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逐渐形成。古斯塔夫·勒庞曾说过,每当面临空前危机时,英雄形象往往成为人们希望的源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以非凡的才智扮演了“人民救星”的角色,正好满足了群众对英雄的需求。

正如太阳也会有黑子一样,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也曾遭人诅咒与诋毁,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负面言论。诋毁、丑化延安的一小撮人,站在仇视与偏见的立场上,对事实进行歪曲。他们利用报刊杂志、小册子及后期的广播讲话等方式,不断丑化延安,说它是暗无天日的罪恶深渊。被广大群众誉为“太阳”和“救星”的毛泽东,也被那一小撮人污蔑为“自大狂”、癆病患者、鸦片吸食者与生活腐化堕落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国共宣传战中更被污为汉奸、封建残孽、野心家等。虽然诋毁延安的人群立场不一,但他们采用的手法却基本一致。这些人或者无中生有,或者恶意歪曲,最终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延安的负面形象可能会使极少数人一叶障目,但绝大多数群众都能识破谎言,“天下人心归延安”局面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受众,就是边区传媒网络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基层群众,包括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部队的指战员等。国统区的受众既有阅读延安报刊的国府高官,也有共产党合法报刊的读者群、进步报刊杂志的读者群等。海外受众包括官方人员、重要报刊的读者群及有关延安的著名书籍的读者群等。边区的群众一方面用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则热情讴歌延安,颂扬毛泽东。各根据地的受众,在各方面模仿延安并加入到歌颂延安的行列中来。国统区与海外华侨受众,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千里奔赴延安,在经济和舆论上支持延安,形成“天下人心归延安”局面。至于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的反应,他们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反将获取的信息用来诋毁延安。“天下人心归延安”,既是延安“革命圣地”形象传播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

延安之所以会在人民心中享有“革命圣地”的崇高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事实上的民主、自由与进步。当然,“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也是促使延安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

王东仓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3
三、时空范围与核心概念	20
四、理论与方法	25
五、难点与创新	26
六、思路与内容	27
第一章 内联外合: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体系	30
第一节 体系的构成	33
一、内部体系	33
二、外部体系	45
第二节 体系的运行	45
一、统一领导,分工协作	45
二、具体策划,各展所长	47
第三节 体系的特点	50
一、隐形的体系	50
二、领导权高度统一	52
三、极其广泛的参与面	56
四、内联外合	57
第二章 综合传媒:“革命圣地”形象之载体	59
第一节 宣传媒介	59

一、印刷媒介 61

二、电子媒介 64

三、其他媒介 67

第二节 艺术形式 70

一、民族特色 70

二、大众化 72

第三节 艺术风格 75

第三章 从神秘到神圣:延安之“革命圣地”形象..... 77

第一节 揭秘延安 79

一、从白色“围城”到“红色堡垒” 81

二、民族解放的熔炉,中国青年的圣地 88

三、民主的模范,中国的希望 96

第二节 展示延安 110

一、集中展示 110

二、日常展示 125

第三节 “革命圣地”的由来 140

一、概念辨析 140

二、延安何以成“圣地”? 143

三、从“天堂”到“圣地”:革命圣地的由来 153

第四章 太阳与救星:“圣地”延安的“毛圣人” 162

第一节 “苏维埃巨头” 163

第二节 抗日领袖 166

第三节 太阳与救星 171

第四节 革命领袖 176

第五节 民主斗士 182

第五章 歪曲与偏见:延安的负面形象..... 188

第一节 歪曲与偏见 189

一、载体与形式 189

二、负面形象	191
第二节 制作群体分析	205
一、立场与目的	205
二、“创作”情形	206
第六章 天下人心归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受众与反应	212
第一节 边区与各根据地受众	213
第二节 国统区受众	217
第三节 海外受众	219
一、海外官方受众	219
二、海外民间受众	221
第四节 天下人心归延安：受众反应	223
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42

导 论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结成了坚固的抗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①

1938年,这首由莫耶作词、郑律成谱曲的《延安颂》刚一诞生,就迅速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抗日形象或由此开始传播开来。事实上,这首歌诞生之时,延安城已经遭受日本飞机的两次轰炸,昔日的古城已变得到处残垣断壁,“庄严雄伟”的古城形象,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后来,就是这样一座破碎的古城,却成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圣地,被人们称作“革命圣地”。但是,延安在动员无数群众参与抗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健康发展方面的贡献,却为抗日战线上许多军民亲历亲见。延安方面的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给国人以抗战必胜的信心。延安在民主建政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火。人们逐渐认识到,延安所走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延安就

① 李焕芝、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第11卷音乐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

是中国的希望。所以，不管是“庄严雄伟”的延安，还是“革命圣地”延安，那些对延安的想象与建构，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今天，当人们理所当然地称呼延安为“革命圣地”时，很少有人会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延安是怎样变成革命圣地的？从什么时候起，都有哪些人，把延安称作“革命圣地”？他们通过什么渠道，使哪些人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机缘巧合，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延安人，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者，笔者在滤过无数选题之后，把目光锁定这一组问题，或许是一种责任、义务和考验的自然回归。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年，是中华民族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十年。十年间，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十年间，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为未来的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民主模式；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区域，延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重视，有人甚至敏锐地发出了“五四过后看延安”^①的呼声。以延安为选题，其历史意义之重要，不言自明。

在社会转型之际，多元甚至混乱的价值标准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困扰，信仰的缺失和道德在金钱面前的溃败，导致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显性缺席，于是有了“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②这句名言。如何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答案虽说是见仁见智，但以史为鉴仍不失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在中共历史上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圆满解决了社会发展和民生幸福问题，把边区首府延安打造成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回顾“圣地”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以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等“边角”史料为主，辅之以政府文件、档案等“正统”史料，借鉴传播学的思路，选取形象学的视角，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察“革命圣地”的“成长”史，进而探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此种做法，必将进一步拓

①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民生问题的提问时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较早见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4/content_13169202.htm。

宽延安史研究的路子,丰富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名词,其实都是从历史时段、历史区域、历史主题等方面,对同一历史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无论怎么区分,关于这一时空范围的历史研究,都是从边区史或延安史这两个角度,沿着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等路径向纵深探究。边区史这一概念突出边区这一空间,延安史研究强调延安时期,本文所使用的延安史这一概念还要小一点,将它限定在延安时期、延安地区。下文就从边区史和延安史两方面,梳理既有研究成果,以期在资料、理论、方法、视野等方面,都有所借鉴。

(一) 边区史研究概况

边区史的研究成就,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整理上。从20世纪50、60年代起,有关机构便出版了一批资料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①8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等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许多档案资料获准开放,使得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资料整理工作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及一些个人,分别整理出版了一大批综合性和针对边区的资料汇编,如《近代中国史料汇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9辑)、《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共14辑)、《陕甘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共5辑)等。^① 这些资料汇编,对深入理解延安革命的历史背景、为延安研究提供具体的材料支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延安)、《群众报》、《新华日报》等报的影印资料和《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等期刊以及一批日记、回忆录、文集等的出版^②,也为研究边区史和延安史,提供了许多生动直观的材料。

① 综合性资料汇编按出版年代依次主要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汇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2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8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抗日战争》(7卷1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陕甘宁边区资料依次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数据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校内用书),1980年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辑:《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共8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共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党校系统内部发行),1986年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小组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史料》,工商出版社,1986年版;陕西省档案馆、陕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共14辑),档案出版社,1987~1988年;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1927~1949:陕甘宁边区部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薛幸福主编:《陕甘宁边区军工史料》,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西北五省区编篡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3卷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刘凤阁主编:《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数据),1992年版;魏协武主编:《陕甘宁边区金融报导史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延安民主模式》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② 如:蔡树藩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央档案馆等编:《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温济泽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等。

以这些丰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边区史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在边区政治史方面,学者们主要以边区民主建政为核心进行探讨。宋金寿、李忠全认为,边区政权由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法院三部分组成,它既不是“三权分立”,也不同于“五权宪法”,而是行政、立法再加上半独立司法的“两权半”结构。^①关于边区政权的性质,学界曾有过“地方政府说”“联合政府说”及“共产党政权”说等分歧^②,后来观点渐趋一致,形成共产党“一元化”领导说^③。王志民、李智勇、宋金寿、王永祥等认为,边区政权带有“抗日与民主”的突出特点^④,它以“三三制”为组织原则,平衡了抗日力量、中间力量、顽固势力三方利益,调动抗日力量的积极性,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⑤靳铭、曾鹿平、高青山等对边区参议会及法制建设等的研究^⑥,与上述研究一起勾勒出边区民主政权的大概轮廓。另外,张国茹、梁海军、刘霞等人的博士、硕士论文,也探讨了边区的民主建政问题。以民主政权建设为视角,固然可以一窥边区民主政治的概貌,但民主政权是如何向基层社会推行民主政治的、推行的效果如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这样一来,边区民主政治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人们全方位认识边区首府——延安的民主形象,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却不能不大打折扣。

经济史是边区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宏观经济到部门经济,都出现了一大批

-
- ① 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62页。
 - ② 朱智文:《陕甘宁边区史研究中几个争论的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 ③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 ④ 王志民:《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社会科学》(兰州)1989年第6期。
 - ⑤ 参见: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 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宋金寿:《“三三制”在陕甘宁边区的实施》,《党史研究》1985年第3期;王永祥:《论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 ⑥ 边区参议会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基本围绕其作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进行论述,参见:高青山:《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靳铭、曾鹿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边区法制建设研究既有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杨永华主编:《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蓝全普编:《解放区法规概要》,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也有从部门法及个别案例探究边区法制建设的文章,集中对边区经济立法、人权立法、破产法及禁毒立法等进行研究,参见: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杨永华:《陕甘宁边区人权法律的颁布与实施》,《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韩松:《陕甘宁边区破产立法》,《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等。

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宏观经济方面,重点探讨了边区经济结构、农村经济、集体和私营经济、减租减息及土地政策等问题。刘昭豪认为,个体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公营经济、合作经济及地主经济,在地位上从重到轻依次排列,共同构成了边区经济的全部内容。^① 阎庆生、黄正林认为,边区8条农业措施推动农业发展并带动农村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面貌,引起农村社会乃至整个边区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细究边区农村经济发展根本原因,不外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边区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② 集体经济方面以合作经济研究为主,李祥瑞通过量化研究发现,到1944年时,占边区总劳力24%的劳动者已经被组织到各种农业合作互助组织中,总数达81100个之多。边区总户数的80%,都被诸如消费、教育、医药、运输等名目不一的合作社吸纳为成员。合作社对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取得抗战胜利,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③ 学界对边区私营经济的研究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有人关注。王致中和魏丽英探讨了边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从限制到扶植的政策、边区私营工商业复杂的资本来源及其对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④ 许建平撰文论述边区私营经济产生、发展的环境、作用及意义,认为边区私营经济的存在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⑤ 肖一平和郭德宏着重论述了减租减息政策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支持了革命和生产建设,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促进了各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解决土地问题奠定了基础。^⑥ 严艳也从产业布局与经济发展角度探讨了边区经济发展情况。^⑦

边区部门经济史研究,可以分作农业、工商业、金融、税收等领域。张扬、闫庆生、孙业礼等探讨了边区农业中的农贷、移民、劳动力等问题,认为因地、因时制宜

① 刘昭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及其性质和特点》,《湘潭大学学报》(社科)1983年第4期。

② 阎庆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李祥瑞:《合作社经济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④ 王致中、魏丽英:《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和实践》,《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⑤ 许建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⑥ 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⑦ 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的农业政策,促进了边区农业及经济社会的发展。^① 闫庆生、李祥瑞、黄正林等撰文指出,边区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自给三个阶段,多种经营的手工业改变了单一的农村经济结构,公私并存的盐业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边区的经济困难。^② 李祥瑞、姚会元、任学岭等认为,边区金融业经历了六个阶段,它与生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极具特色的边区银行兼有从事金融和管理商贸两种职能,边币在与法币斗争中逐步完成其支持建立边区经济体系的功能。^③ 闫庆生、黄正林、李俊良等认为,边区税收以统一累进为征税原则,目的在于保护边区经济,是边区社会发展的一个经济杠杆。^④

社会文化史是边区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方面的论著不多。胡新民、李忠全等在他们的专著中探讨了边区的民政工作问题,朱汉国也在其编撰的通史性著作中对边区相关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⑤ 其他的研究者通过专题文章,对边区的社会变迁与社会改造、社会保障、人口及医疗卫生等问题进行探讨。陈舜卿、杨志文、赵文、齐霁、黄正林、温金童、高冬梅等人的文章,共同勾勒出边区社会文化的新变化:人口流动及社会改造活动,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变迁和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边区经济及文教卫生工作进步,使边区群众的民族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婚育意识等发生重大变化,乡村社会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培育出合作经济萌芽,通过普选形成了民众为主的乡村权力主体,民众在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下享受一个

① 参见: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闫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孙业礼:《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参见:闫庆生:《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侯天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天水师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祥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盐的产销及其经济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③ 参见: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李祥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银行》,《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姚会元:《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党史研究》1985年第3期;任学岭:《论陕甘宁边区的边、法币斗争》,《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④ 参见:闫庆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李俊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税收》,《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 胡新民、李忠全、阎树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无毒绝匪的安居乐业环境,人口的文化与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提高。^① 李会先阐述了边区民众动员模式及途径,认为中共及时调整动员策略及口号,从而获得边区及全国民众对中共的支持与认可。^② 任钟印、郑涵慧、沈绍辉、苗均全、张秦英、黄正林等分别就边区的两次教育改革、教育方针政策、学校教育(包括高校、师范、义务教育等)及社会教育等内容,对边区的教育进行了研究,其中黄正林认为,正是有效的社会教育,真正有力地提高了中共政权在民众中威望,增进了二者间的亲密情感。^③ 张良杰、刘丽丽、崔萍萍等的学位论文,也对边区的文化建设进行了探讨。^④ 以上内容,对本文关于民众与领袖形象间关系的解释,能够提供有力的知识支持。

(二)延安史研究概况

为了方便研究,受“延安时期”一词的启发,本文引入“延安史”这一概念,重点梳理那些以延安时期中共党史、延安的新闻出版史、文化艺术史等为对象的研

-
- ① 参见:陈舜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牛昉、康喜平:《陕甘宁边区人口概述》,《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赵胜:《陕甘宁边区禁毒评介》,《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杨志文:《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政策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赵文:《试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齐霁:《陕甘宁边区禁言禁毒运动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论述》,《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温金童、李飞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齐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及其历史启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黄正林:《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等。
- ② 李会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未刊博士学位论文。
- ③ 参见任钟印:《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两次教育改革》,《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郑涵慧:《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的研讨》,《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张秦英、刘汉华:《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苗均全、刘东朝:《论民主革命时期延安大学的办学特色》,《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沈绍辉:《陕甘宁边区的师范教育》,《延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杨文忠:《我国义务教育立法历史发展及其评价》,《河北法学》1994年第4期;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 ④ 张良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出版”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未刊硕士论文;刘丽丽:《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化》,湘潭大学2008年未刊硕士论文;崔萍萍:《陕甘宁边区文化社团活动与大众文化建设》,西北大学2008年未刊硕士论文;喻志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未刊硕士论文等。